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职业化倾向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因

向筱萱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广东珠海 519085)

摘要: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了求道不求术的非职业化社会定位。学术职业化风气在清朝的出现,在历史上屡现端倪。先秦时代是知识分子的定位构建时期,距离职业化最远的阶段。汉学对于经典研习的方法,为后世知识分子职业化的形成埋下了早期的学术基础。唐朝科举制度的要求,为后世知识分子职业化倾向的出现呈现出一种道德上的可能。宋代对于士的界定方式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构架中的反职业化因素;书院的学习模式,为后世知识分子学术研究职业化创造了一种学术精神前提。明代“学问”沦为一种附庸于仕途的手段,加之业余精神影响,使明代知识分子远离职业化倾向。对考据学的重视及重利商业风气的影响,结合历史上诸多因素,清代知识分子学术研究走向职业化。

关键词:知识分子;职业化;士阶层;中国古代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19)03(b)-0175-02

在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到儒家“君子不器”这一精神根源以及崇高的载道理想的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了求道不求术的非职业化社会定位。知识分子们被期待成为胸怀天下且道德高尚的全才,而非精通于某一学科或专业特长的专才,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欲望,以天下为己任,这与职业于某一专长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形成鲜明对比。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清朝,随着经典研究的考据化,一种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之风在社会上大为盛行,知识分子们的载道理想中所包含的对个人道德的追求以及对仕途的热情,被严谨引证的治学之风所替代了。字面之学替代了字内之学,小学之道替代了大学之道。在此时,那些同前朝一样学习经典的人,已不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而演变为学者。

这种职业化风气的明显转变出现在清朝,然而,这种倾向的存在并不是一时间的陡然发生,而是在千余年的古代社会发展中已屡现端倪。

1 先秦时期——文以载道的非职业化时代

随着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对圣王的期待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君主失去其道德权威,不再掌握“道”。而此时,伴随“学术下移”崛起的士阶层开始将自己定义为高尚的“道”的持有者,拾回君王失去的道。知识分子载道者的核心身份在这一时期确立,载道这一使命意味着对社会伦理、道德修养等问题的广泛关注,这就暗含着对知识分子并不能局限于专研某一专业知识或技术的要求。同时,儒家学说虽在当时并不为显学,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论语·为政》中的记载“子曰:‘君子不器’”,包含了轻视专业素养的业余精神,这为后世成为主流思想的儒学埋下了非职业化思想渊源。

因此,在先秦对于知识分子及其职责的定义中,所存在的无疑大多是促使知识分子远离职业化的因素,中国知识分子的非职业化性质在先秦的轴心时代基本界定。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职业化的倾向并无征兆,作者简介:向筱萱(1999,2-),女,四川自贡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方向。

各种促成职业化的条件也尚未出现,此时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纯粹的一代知识分子,此一时期亦是中国知识分子距离职业化最遥远的阶段。

2 汉朝时期——职业化学术基础的形成

在汉代,汉武帝遵循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从“诸子百家之学”转变为“正统官学”。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开始,先秦的儒家经典文献的注疏研究受到重视,推动了该时期儒学向经学转化的过程。“经学”即以儒家经典为传诵与研究对象的学问,这就包含了对经义解释及编订勘校的需要,这种需要则意味着对章句之学的关注,也进而衍生出一种着重内容考据的治学之道,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则是对汉学对经典的研究侧重训诂解说这类字面之学的真实写照。

由于汉学对经典的研究具有官方意识形态下的非批判性思维,此时的经学研究并不具备近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学术意义,但是其对于经典的研习中章句之学的重视、考据化的治学方法,在客观上为后世知识分子职业化的形成埋下了早期的学术基础。

3 唐代时期——职业化道德前提的形成

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明经科对经典的记诵被设置为考查的重点,这往往使应考者对经典的学习局限于对文字表面的记诵上,而难以去理解经典的深入内涵以及经典内涵中所广泛联系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而进士科则重视诗赋创作,久而久之,则呈现出唯求文辞华丽浮艳、注重格律技巧,而缺乏义理道德,脱离社会关注的创作风。这些唐代开设的科举科目的考察形式呈现出了重文轻德的特征,人们的学习因此偏向功利化,知识分子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更加重视经典记诵及诗赋创作等具体能力,对于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关注则大大降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代的通过考试制度对学的反向引导,使知识分子沦为皇权的附庸,这无疑就极大地淡化了知识分子的载道理想,而增加了其对掌握某一专业技长的追求。

4 宋代时期——职业化政治前提与精神前提的形成

4.1 地方士族崛起对知识分子标准的重定义

宋代政府不断完善科举制度以鼓励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而士人则不断呼吁政府在州县建立学校,以帮助生准备考试,再加之印刷术的推广使各种图书经典广泛流传,教育的普及度在这一时期大幅度提高,受教育的门槛则被降低。受过良好教育的考生数目正在快速增加,但能够成功获得官职踏入仕途的机会却并未增加。

在传统模式中,知识分子通过入仕实现其载道理想,并以此认证其士阶层的身份。而当大量因受到教育而自认为属于士阶层的人无法进入仕途施展政治抱负时,为了维持士阶层的身份,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方案及对士的新界定方式。大量被排挤在过度饱和的国家官僚政治体系之外的宋代知识分子,将其活跃范围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大量地方上拥有一定财富的家族开始崛起,并投资教育,从而逐渐转变为士族。如此,宋代士从政治精英转变为地方士族,成为士的衡量标准仅在于是否接受教育,而认为士就应该入仕做官这一看法遭到越来越少人的认可。这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所谓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需要具备的是“学”的知识素养,而淡化了对其政治理想及联系社会的关注。

4.2 书院的出现提供职业化精神前提

宋代书院的产生同样与该时期职业化倾向因素的形成有一定客观的联系。书院的起源是由于宋代官学衰微,一些富有家庭创办私人学校以供其子弟接受教育。其后,书院逐渐演化为理学家推广学说的场所,书院则成为结合理学学术研究与课程教学的民间学术机构和教学机构。虽然理学的目标是所有人寻找一种永恒的、具有普适性价值观念与信仰,其学习研究着重于义理而轻视类似于汉学模式的字词章句之学,从学习内容上讲,这与职业化的中注重专业知识的特征大相违背,但从书院学习的学术研究性质来看,其中包含的辩证批判思维以及学术钻研态度,在外在形式上恰恰与后世学术专业化、职业化倾向中包含的某些要素不谋而合。

5 明代时期——非职业化特征的反转期

5.1 君权强化下的文化附庸

明代知识分子的非职业化倾向似乎比此前的许多朝代都要明显。这首先归因于君权的不断强化下官僚职能的变化,明代的官员并不需要掌握某种专业技能,而只需要成为协助统治的执行人。在准备科举考试中所学习的文学修养及经典要义,不过是知识分子谋得职位的手段,而在获得官位成为人生最高荣誉的前提下,与象征着仕途官位的文化与知识也拥有了荣耀人生的意义。

在明代君权的不断强化下,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被弱化了,文化与知识成了一种附庸于仕途的手段,自然难以独成一家,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

5.2 “业余精神”的非职业化偏见

明代知识分子对学问本身有着一一种“非职业”的偏见,这种偏见也同样来源于一种反商业反功利主义的“业余精神”,这似乎与先秦儒家的“君子不器”相呼应。正如在明代,画界形成一种官僚本人即画家的风尚,明

代知识分子认为职业化使文化变得单调狭窄,他们的审美取向倾向于具有完整人格体验的全面发展的“业余型”人才。

因此,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于职业化倾向有着明显的背离,而相对于宋朝知识分子从学术内涵上与职业化的相悖,明代知识分子则更倾向于在外在形式上对职业化的轻视与反感。

6 清代时期——职业化倾向的成形

明朝灭亡后,清政府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统治,这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知识分子们开始对明朝灭亡进行反思,其中自然不可避免对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们所信仰与传承的“道”的质疑与重探。而道之所在,正是成于现代圣贤而存于经典,知识分子要想寻道传道,就要从经典中去挖掘。因此,清代知识分子们相信,如果明朝以及其所代表的汉文化失败了,那么蕴含其文化根基的经典内容也就存在问题,于是开始重新对经典进行正本清源。

同时,江南地区商人和儒生的合一使得当时的知识界染上了一股重利风气,而满族的统治使得汉人入仕机会减少,士人们普遍形成了当轻视政治而重视当下、放弃求道转而求名的思想观念,以治学为生,将学术研究作为赚取钱财与名利的工具。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分子们的载道理想中所包含的对个人道德的追求以及对仕途的热情,被严谨引证的治学之风所替代了。结合前代职业化倾向历史演变中预先埋下的各潜在因素与条件,知识分子对于前代经典与文化的继承走向了轻视道德内涵而重视专业化学术研究的朴学分支,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倾向在清朝这一时期明显地发生了。

7 结语

清代知识分子职业化风气的形成,绝非基于一时的条件与原因,而是联系了历史上出现的众多偶然与必然的因素。而在清末出现的知识分子职业化风气,属于一种知识分子社会的非健康状态。然而,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内部自我调整还没得以施行,西方文明已伴随着坚船利炮闯入了中国古典文明,在近代翻天覆地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职业化问题又开始面对新的考量与挑战。

参考文献

- [1] [以]尤锐. 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 [美]包弼德. 历史上的理学[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3] [美]艾尔曼. 从理学到朴学[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4] [美]约瑟夫·列文森.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5] 李振宏. 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J]. 中国史研究, 2013(1): 56.